

直播电商模式下品牌方与主播合作路径优化探析

■ 禹莉

品牌方借助主播达成产品曝光的目的,进而实现销量转化;主播则通过品牌资源实现内容输送与商业盈利的目标。二者合作甚密,利益高度缔结,往往伴随着目标不一致、责任界定模糊、协同效率不高等问题,“如何在复杂利益格局中捋顺合作模式、提高协同效率”成为直播电商发展进程中的核心挑战。

直播电商模式下品牌方与主播合作关系的模式特征

直播电商作为一种新兴的电子商务形态,融合线上销售与消费者互动,满足用户的个性化消费需求,也为品牌方带来了新的获客模式。主播与品牌合作展现出目标驱动多元化、合作模式灵活化、内容融合密切化等典型特征。其中,从合作目的来看双方存在明显不同。品牌方往往期望通过直播模式在达成销量提升的同时,实现品牌知名度的提升以及用户对品牌认知的改善;而主播更注重短期可获利性以及粉丝量级的快速增长,倾向于推广节奏紧凑、语言表述直接有力的强打折促销型产品。这种情况下,只能求同存异。虽然对双方合作

的达成没有产生影响,但执行过程中会对带货效果以及品牌形象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势必导致合作模式趋向多元化。

除了传统的短期佣金合作模式以外,保底合约方式、专供专销模式、战略捆绑模式将逐渐增多。由于平台机制和市场环境的变化,合作结构复杂性进一步升级,不同类型和级别的主播与品牌合作的方式日益灵活,从单次交易合作到中长期合作资源置换、对合作稳定性提出更高要求,合作从“偏重销售向供应链全流程协同”转变。

直播电商模式下品牌方与主播合作的优化路径

(一)强化契约机制,规范合作边界

合作关系的制度化、规范化,离不开契约机制这个基础。在直播电商特定的语境范畴内,品牌方跟主播之间互动频仍、结构繁杂,要是不存在明晰的权责划定,非常容易在合作阶段引发误解及纠纷。当前不少合作仍旧处于“临时搭配”或“经验主导”模式范畴,合同内容多沦为形式,数据归属、退换货责任、内容管控

和违约处理等关键条款,缺少精细化界定。品牌方需依据合作区分出来的不同层级,形成对应层级的标准化合同样板,明确合作内容、流程进程与权责分界,削减合作隐患。

就不同主播的资源能力及内容风采而言,合同可规划出有差异的合作路径:对头部主播合作,可采取“保底与提成相融合”的激励复合机制,保障主播应得之收益,且激发其销售积极性;对中腰部主播合作,不妨设置分阶段 KPI 及浮动式佣金,引发其成长冲劲与内容完善意愿。

(二)完善沟通机制,提高协同效率

高效、无障碍的沟通机制,是保障直播合作高质量执行的关键环节。但在实际落地执行过程中,品牌方和主播时常因为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导致沟通受阻或理解错位。直播前选品和内容筹备阶段,品牌方没有第一时间提供准确的商品信息、清楚表明品牌定位,导致主播在话术斟酌与脚本架构中“自我施展”,很容易出现表达失误,甚至可能造成舆论危机。

在直播过程中,如果缺乏专人对接和反馈沟通,主播临场发生问题不能快速妥善解决,还

会影响转化效率和用户真实体验。品牌方需要配备专人或小组与主播及运营团队进行高频、清晰、即时的沟通,在直播过程中的关键时间节点,就直播间脚本确认、优惠规则设置、退换货流程制定等方面进行核对,避免因为传递错误或进度延误带来执行错误。同时,还可依托平台机制或专业软件,创建相同标准的沟通过程记录、任务跟踪以及业绩反馈机制,推进合作从“点到点的勾通模式”向“流程化的协同模式”转变,提高沟通效率,改善各环节的衔接关联与响应水平。平台还可从制度层面推动协同机制的统一化打造,比如制定直播任务流程、数据共享接口、应急处理方案,协助品牌方和主播在系统上做到实时信息和进度的互通共享,从根本上打破“各自为政”的合作“壁垒”。

(三)注重关系经营,提升合作黏性

随着商业思维向长期合作转化的必然趋势,品牌方希望从主播那里获取稳定且持续性的直播收益。在合同管理和账期回馈的基础上,品牌方更应把主播直播带来的持续收益纳入战略合作层面来考虑。某种意义上讲,主播不仅仅

是一个品牌的销售员,更是传递品牌价值和消费者信赖的载体。忽视对主播的成长引导和情感纽带维护,将导致一种简单的工具化合作关系,最终打击双方积极性和忠诚度。品牌方可通过和主播共同选品、共创内容 IP、共建品牌知名度等形式,培养主播对所播品牌的感情。同时,在大型促销日节点,邀请主播体验测试新品、参与品牌溯源、线下走访品牌工厂,让主播对品牌的深层内涵和产品优势有更深了解,从而在直播时能够更贴近消费者、更具可信感地把品牌利益点、兴奋点传递出来。对合作时间长、合作效果好的主播,可设计合作主播等级积分奖励制或“三年战略合作发展计划”,提供付费流量支持、多渠道助力和品牌方资源倾斜,促使主播从短期合作向长期合作转变。

综上所述,伴随直播电商的快速发展,品牌方同主播的合作已超越传统交易逻辑界限,过渡到深度协同与价值共创。只有创建依托信赖、规范与长远洞察的合作机制,才可在变幻无常的流量场景中实现稳定递增与品牌沉淀。

(作者单位: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新时代党建引领农村基层治理的价值意蕴

■ 候子腾 刘鑫决

一、政治引领:筑牢农村基层治理的“根”与“魂”

(一)强化党的执政根基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其政治引领作用直接关系党的执政根基稳固。新时代党建引领农村基层治理首要任务是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农村落地生根。例如,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实施“党建+红色教育”工程,通过挖掘本地红色资源来打造教育基地,定期组织党员群众开展红色主题教育活动,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让群众认识

到党的领导是农村发展的根本保障,从而坚定拥护党的领导,筑牢党在农村的执政根基。

(二)引领乡村发展方向

党建引领为农村发展提供正确政治方向和战略指引。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基层党组织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引导农民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特色产业。山东省寿光市作为“中国蔬菜之乡”,其蔬菜产业蓬勃发展离不开党建引领——当地基层党组织引导农民成立蔬菜合作社,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打造蔬菜品牌,并通过“党支部+电商”模式拓宽

销售渠道,实现蔬菜产业从传统种植向现代化、规模化、品牌化转变,成为全国蔬菜产业发展标杆,为其他地区农村产业发展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二、组织保障:凝聚农村基层治理的强大合力

(一)构建严密组织体系

新时代党建引领农村基层治理需构建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通过优化基层党组织设置、加强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确保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实施“支部建在产业链上”行动,根据

当地农业产业特点,在蔬菜种植、畜禽养殖、农产品加工等产业链上建立党支部,将党组织嵌入产业发展各环节,使党组织更好地发挥组织协调作用、整合产业资源、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例如,在蔬菜种植产业链党支部引领下,当地形成从种苗繁育、种植管理到销售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带动了农民增收致富。

(二)整合多元治理主体

农村基层治理涉及政府、市场、社会等多方主体,党建引领通过组织联动、资源整合等方式构建协同治理格局。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创新

“党建联盟”模式,联合周边村庄、企业、合作社成立联合党委,统筹推进产业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各成员单位在联合党委协调下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企业为村庄提供技术培训和就业岗位,村庄为企业提供土地和劳动力支持,合作社负责农产品销售和 market 对接。该协同治理模式使桐庐县农村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提供成功范例。

(作者单位:候子腾,沈阳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鑫决,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滨州市存量土地盘活利用的策略研究

■ 姜文潇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优化城市工商业土地利用,加快发展建设用地二级市场,推动土地混合开发利用、用途合理转换,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全面盘活存量低效用地,有利于推动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缓解土地供需矛盾,为高质量发展提供用地保障。

一、滨州市存量土地盘活利用成效

(一)盘活规模持续扩大,制度化整治成效显著

滨州市以“五未”土地(批而未供、供而未用、用而未尽、建而未投、投而未达标)为靶向,建立全域清查和分类处置机制。2024 年全市盘活闲置低效用地达 2.16 万亩,同比增幅高达 166%,处置批而未供土地 405.67 万亩。政策层面通过《闲置低效用地盘活实施方案》等文件,形成“一地一策”动态管理框架,将盘活任务与“标准地”供应、产业升级捆绑推进,为山东省闲置土地治理提供了“滨州样板”。

(二)创新模式多维突破,市场化路径释放存量潜能

一是沾化区“府院联动+项目招引+金融资本”。成立由法院、工信、自然资源等部门共同

参与的“府院联动”工作专班,全面梳理排查全区闲置土地、低效用地状况,一企一策靶向解决问题。二是阳信县“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腾笼换鸟”。由县政府主导全面摸排辖区闲置土地与低效用地实际情况,积极引导通过考核开发、股权转让等二级市场方式盘活利用,缩短土地取得周期,实现土地保值增值、腾笼换鸟。三是土地使用税差别化改革。2023 年 3 月,滨州市在无棣县试点,实施城镇土地使用税差别化改革,通过对参评企业按照评价结果分别适用不同税额标准加以征收,为高效益企业减负,倒逼闲置低效用地退出或转型利用。

二、滨州市存量土地盘活利用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土地供需矛盾突出

全国 18 亿亩耕地保有量红线不可逾越,保护耕地与发展用地之间的矛盾尖锐,国家对土地资源管理日益严格,使得滨州市新增用地规模和指标获取难度大增。例如,滨州高新区,规划面积仅 7.67 平方公里,建设用地存量严重不足,导致新项目难以落地,极大地制约了城市发展进程。截至 2024 年 5 月底,全市共有 2009 年—2023 年批而未供土地超过 2.67 万

亩,闲置土地 8200 亩,数量巨大。

(三)规划统筹引领不够

各县市区原有的国土空间规划在指导具体城市更新、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处置等方面,部分存在缺乏前瞻性的情况。同时,由于缺少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存量建设用地专项规划指导,缺少对产业发展和公共服务用地以及拆旧、保留、保护等政治任务的统筹,导致发展空间不足。此外,相关规划由于衔接性不够,受政策限制调整时间长、难度大,导致土地盘活再开发不及时。

(三)盘活处置难度加大

通过近年来的专项整治,剩下待盘活的土地多为“难啃的硬骨头”,部分土地历史遗留问题较多,存在使用权人失联、土地及建筑物涉法涉诉涉押的难题。对政府而言,与使用新增用地相比,盘活存量土地成本高、周期长,需要在拆迁补偿安置、收益分配等方面做大量工作。对企业而言,土地获取和保有成本低,包括税费在内的流转成本过高,导致企业自主开发或转让的积极性不高。

三、滨州市存量土地盘活利用的建议

(一)完善土地利用政策

通过完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指标挂钩、产业扶持和税费优惠等政策引导,充分调动再开发主体积极性。对收回、收购存量建设用地用于再开发的,在依法补偿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给予原土地权利人一定奖励,同时核定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额度,激励盘活存量建设用地。探索土地混合开发、空间复合利用、容积率奖励、跨空间单元统筹等政策,推动形成规划管控与市场激励良性互动的机制。鼓励各县区根据“亩产效益”评价改革结果,对优先发展类、支持发展类、提升发展类、限制发展类四类企业实施差别化用地政策,倒逼落后产能企业转型升级。

(二)加强规划管控引领

各县市区结合实际编制存量建设用地盘活利用专项规划,做好与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协调衔接。按照突出重点、先易后难、分步实施原则,制定低效用地再开发年度实施方案。开展专项规划中期评估优化,形成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低效用地规划体系和更新机制。强化规划管控,做到国土空间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多规合一,确保城镇建设一本规划、一张蓝图、一图到底,避免盲目发展造成大量土地闲置。

财税政策促进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路径

■ 刘雪艳

随着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与生态文明建设深入推进,传统高耗能、高污染的工业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绿色发展已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国家和地方密集出台绿色制造支持政策,特别是财税政策在激励企业绿色化、智能化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广西作为资源型地区,面临绿色发展压力与产业结构优化需求,深入研究财税政策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作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与政策价值。

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内涵与发展逻辑

制造业绿色转型是指在环境约束和资源限制日益强化的背景下,制造业利用绿色技术创新、资源高效利用和生态友好型模式,推进清洁化、低碳化和智能化发展,协同提升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绿色转型不仅是生产方式的改进,更是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变革。

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趋势下,德国、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通过科技驱动、产业政策调整、环境规制强化等手段引导制造业绿色升级。中国制造业在能耗高、排放大的现实基础上,已逐步向绿色效率提升与智能演进方向发展。绿色转型的核心逻辑体现在生态环境保护、能源结构优化与生产体系重塑三方面,形成绿色产品供给与绿色消费互动反馈的螺旋机制,推动制造业系统性跃升与可持续发展。

激励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财税政策研究

现行财税政策主要体现在绿色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两类方式。绿色税收优惠在短期和

长期均能激发企业技术创新意愿,降低企业转型中的环境成本与制度成本,从而提升绿色研发与产出能力。财政补贴对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增强研发投入能力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尤其是在非国有与规模较大的制造业中效果更为明显。此外,当前的财税政策效果存在地区差异性,与适度区间问题,因此亟待在明确政策目标、增强执行精准性基础上,构建更系统、协同的绿色财税支持体系。

财税政策促进广西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路径

1.推动绿色税收优惠制度精准落地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快绿色税收政策在制造业中的精准落地,依托自治区现有产业布局,建立涵盖申报、审核、跟踪的全流程绿色税收优惠执行机制。对于符合绿色发展导向的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制造企业,应明确具体的税收减免范围、时间和幅度,并同步建立由财政、生态环境、税务等多部门组成的协同管理平台,保证税收政策落实到项目、落到企业。结合国家绿色制造体系建设要求,可以优先对在绿色工厂、绿色设计产品、绿色园区等方面认定的制造企业实施增值税、所得税等税种的减免扶持。

广西还应将晶风能源科技、远景能源科技等绿色龙头企业作为绿色税收政策的重点支持对象,形成以重点带动区域、以绿色带动全链条的激励格局。为提升政策执行效率,还需推动税务信息系统与生态环境指标数据系统

的对接,提升对绿色项目的自动识别与税收政策匹配能力。

2.构建财政补贴资金多元投向机制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应当健全财政补贴政策的结构设计,建立多元投向机制,扩大财政支持的覆盖广度与产业协同性。财政资金应向具有绿色溢出效应的制造环节倾斜,优先支持智能化生产线改造、绿色供应链建设、环保设施升级等高效能转型项目。针对新能源汽车、风能设备、储能电池等快速增长产业,应实施“财政引导+企业配套”的共担机制,激励企业加大技术投资力度。对于传统行业如有色金属冶炼、水泥建材等领域,财政补贴应结合其绿色转型路径,引导企业发展高附加值绿色产品,如优质铜箔、汽车铝轮毂、航空铝型材等,提升产业链竞争力。广西还需引导市县县政府设立专项绿色转型基金,并探索将社会资本引入绿色财政补贴体系,政府出资撬动金融机构和产业投资基金,为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提供稳定、长期的财政金融支持保障。

3.探索数字化转型财政激励政策体系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应当积极探索面向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财政激励政策体系,针对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平台建设等关键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给予一次性财政补贴、分阶段绩效奖励及技术服务采购等支持方式。对建设数字化管理系统,实现能效监测和碳排放追踪的制造企业,财政部门应配套技术引导经费,并优先纳入自治区绿色转型示范试点。依

托广西数字政府工程,应推动财政、工信、科技等部门联合建立“绿色+数字”财政激励目录,对数字化设备采购、智能工厂改造、工业软件研发等项目设定专项资金池,按项目类别、能效提升幅度及投入产出效益分类核定补助额度。此外,应完善相关财政资金的评估反馈机制,运用数字化工具动态监测资金使用成效。

4.优化财政激励政策的评估反馈机制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完善的财税政策激励评估反馈机制,推动财政资金从“事后补贴”向“全过程管理”转变。在政策实施前期,应依托行业主管部门、统计系统和地方高校研究机构,建立绿色财税政策影响预评估模型,结合产业特征和企业能耗数据,科学测算财政支出与绿色转型产出之间的边际效应。在政策执行阶段,财政与税务部门应联合建立“项目+企业”双维度跟踪机制,依托大数据技术对补贴流向、使用效率和能效改造结果进行动态监管。

在政策周期结束后,应组织第三方开展绩效审计与实地核验,并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政策参数、优化资金配置。广西还可以探索“绩效导向+激励分档”的资金发放模式,将绿色转型成效作为核定下一轮激励额度的重要依据,提升政策激励的持续性与精准性。

5.强化绿色财税与产业政策联动协同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应当推动绿色财税政策与自治区产业政策深度融合,构建财政引导、产业承接、市场协同的绿色政策体系。

广西可在制定重点产业发展规划时,设立绿色导向型财政支持条款,将财税激励纳入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智能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全过程发展路径。对于新能源汽车、风力发电装备、储能电池等绿色产品产能扩张显著的产业,应同步配套专项税收减免与设备升级财政补贴,形成“技术改造—产品升级—市场拓展”一体化政策支持链条。同时,广西应加强自治区内重大制造业项目的财政统筹管理,推动相关政策统一归口协调,避免部门间政策叠加与资源浪费;依托现有绿色制造示范园区,应组织多部门联合发布绿色财政与产业扶持目录,明确企业申请条件与办理流程,促使政策红利应享尽享。

总之,广西制造业绿色转型正处于关键窗口期,财税政策作为引导绿色发展的重要工具,已在推动企业节能减排、设备更新与智能升级中发挥重要作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应持续加强绿色财税政策顶层设计,健全以绩效评估为导向的财政支持体系,建立覆盖绿色转型全过程的资金管理机制;应构建财政、产业、环保等部门协同工作平台,聚焦重点行业、关键环节,优化资源配置路径,借助“资金引导+政策配套”双重驱动,形成绿色制造高质量发展合力。

本文入选 2024 年度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财税政策对促进广西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4KY1655)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桂林学院)